

1303

泰寧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泰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泰宁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泰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六年十月

目 录

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 杜明同志生平简介……北京《东城老年报》编辑部（1）
- 永留清白在人间……北京《东城老年报》编辑部（5）
- 半个世纪的追忆……卢衍珙（11）
- 师表吴献琛先生轶事……严晋禄（17）
- 悬壶济世五十载……杨孔修（22）
- 民国泰宁县长郭公木……郭正学（28）
- 抗战时期的泰宁特种民众教育……陈家辉（31）
- 泰宁县立初级中学校歌……陈 雄（35）
- 民国时期土匪对洋坑村的三次洗劫……杨大椿 杨孔修（39）
- 流氓赌棍黄新寿二三事……肖名俊（46）
- 泰宁旧庙会……陈德培 梁印浩（51）
- 匪酒……梁印浩（57）
- 话说秀才……肖名俊（59）
- 泰宁工业工作的片断回忆……朱 炜（65）
- 省委领导为北溪电站排忧解难……陈亨楚（73）
- 泰宁越剧团创办琐忆……沈国镇（77）
- 上青乡的成人教育……黎盛理（84）
- 三贤在泰宁……陈 雄（88）
- 明末隐士邱嘉彩……陈 雄（95）

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杜明同志生平简介

北京《东城老年报》编辑部

杜明同志是福建省泰宁县人，1911年6月出生，1994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团打到了福建泰宁，20岁的杜明接受了革命宣传，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条件异常艰苦，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刚刚结束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参军不久的杜明跟随部队艰苦作战，英勇杀敌，不怕牺牲，1931年8月火线光荣入党。在巩固中央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斗争中参加数次战斗。在攻打赣州时，我军处在敌人夹击之中，腹背受敌，形势危急，杜明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置生死于度外，后在红五团的接应下突围成功。

1931年11月，我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杜明同志参加了会议的保卫工作，负责为大会站岗放哨。1933年春，杜明同志调到总部机关接受培训，学习打旗语、吹军号等通讯联络技术。培训后在中央政府电话总队当电话兵。他虚心好学，技术熟练，保证了毛主席和领导机关的通讯联络。这段时间也是杜明同志倍感幸福的时期，在瑞金叶坪，杜明同志和毛主席、徐特立、项英等领导同志同住在一排祠堂里，共同生活，朝夕相处，经常聆听领袖的教诲。在何叔衡同志的安排下，杜明同志护送林伯

渠同志从瑞金县城到叶坪工作。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架设第一条电话线的工作。

1933年12月，杜明同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一期保卫训练班学习，是我党培养的第一批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他和毛泽民同志在一起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央总供给部、中央被服总厂、中央印刷（造币）厂的特派员。

长征开始后，杜明同志奉命调任中央警卫营特派员，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安全。他跟随毛主席，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从江西到陕北，跨越11个省，参加了强渡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攻占娄山关、抢渡大渡河等战斗，两次出入草地，历尽千辛万苦。遵义会议期间，他担任会议的室内保卫工作。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杜明同志调回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任侦察部检查组组长。并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保卫工作。1936年，地方军阀偷袭我中央机关临时驻地瓦窑堡，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机关、部队已相继撤离，可毛主席、局副局长、朱总司令还在办公室研究敌情和对策。杜明同志3次进入主席房间，报告敌情，劝首长迅速离开。当他们刚刚过了小河，敌人就用机枪从被占领的山坡上扫射过来，杜明和其他同志机智勇敢地把首长护送到安全地带。1937年春，杜明同志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了修建延安飞机场和挖窑洞等劳动。

1938年抗大学习结束到抗战胜利期间，杜明同志先后担任了山东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山东军区锄奸部部长，115师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山东军区第四团政委等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杜明同志是山东公安工作创建人之一。

担任了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为巩固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设，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做了大量的工作。1947年秋，调任华东野战军保卫部部长、山东兵团保卫部部长、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随部队攻克南京，解放上海。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杜明同志直接参加的重大战役、战斗20多次，曾两次光荣负伤，获多枚战斗勋章。

建国后，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央公安部干部学校教研处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保卫处处长，中央农垦部工业处处长，贵州省农业机械局副局长，贵州省机械厅副厅长等职。他服从组织安排，党让干啥就干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离开首都支援三线建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贵州工作的20年里，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跑遍了贵州的60多个县，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为贵州省农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他坚持真理，严守党的纪律，设法保护干部，积极开展工作，表现了一个老党员、老红军高尚的政治品德。

离休后，他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关心和支持改革，思想上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担任东城区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积极参加机关离休支

部的学习和活动，热情参加区老干部文明监督队活动和老干部报告团活动。严于律己，勤俭朴素，保持了老党员老干部的革命本色。

杜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永留清白在人间

北京《东城老年报》编辑部

庄严肃穆的告别室内，安卧着老党员、老红军、老干部杜明同志的遗体，他的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以及杜明同志生前友好谷牧、江华、王首道、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等单位和个人敬献了花圈。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陈广文、东城区委书记许海峰、区长刘晓晨、市老干部局副局长李景芳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告别仪式。

朵朵白色的小花寄托了人们无限的哀思，条条洁白的挽联象征着杜明同志磊落的一生。

房子 论资历，杜明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论资格，1950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任命，他担任了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1979年他从贵州省机械厅副厅长的职务上离休回京，关系落在了东城区委机关。一家人挤在了两间小平房里。贵州单位来人了：“杜厅长，单位打算给您在北京买个四居室……”，“不行！哪能花公家的钱给我买房住。”人事处长来了：“杜厅长，咱们再商量商量……”，“不行就是不行！”磨破了嘴皮还是那句话。没办法，最后算是组织决定买了个小三居，让老杜从那又黑又潮的小西屋里搬了出来。

市里下来一批房，分房同志第一个找到老杜让他先挑房

间。“我挺好，我够住。”不管怎么动员他总是这句话，直到临终，老杜一家三代仍然住在小三居里。

票子30年代，杜明在中央总供给部、中央被服总厂工作过。经他手的物资装备、生产的红军军服数也数不清。然而他一生简朴，简朴得近乎清贫。终年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涤卡衣裤，有的上面还打着补丁，那是老杜的杰作。小提包连连补补用了20多年，行军床还是战争年代用的那种几根棍棍中间一块帆布，收起来可以打进行李的名符其实的行军床。呢子大衣则是用当年缴获的日本军毯改做的，前两年老杜买了包颜料染成黑色。这又沉又硬还不挡风的“战利品”，老杜穿了大半生。

30年代，杜明在任中华苏维埃电话总队中队长时，为中央政府架设了第一条电话线。离休后家里没有电话，他从没向组织要求过。区长亲自批准为他装电话，号码跑下半年多了，老杜硬是不让安：“楼下有公用电话，家里用不着装。”工作人员趁他住院时“插空”把电话装上了，惹得老杜好一通发火。电话装上了，孩子却没见过他往外打过电话，为啥？怕花公家钱呗！

1934年，杜明在瑞金中央印刷所工作时，参加过中央苏区早期的货币印制。然而在他的一生中，花公家钱时，他紧而再紧，近乎吝啬，为公家花钱时，他却倾其所有，从不犹豫。1982年国库券首次发行，他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买成国库券，以后每年买200元，这是他一个月的所有收入。怕给会计添麻烦，他要求单位一次扣清。

车子在人们的记忆中，老杜从没向公家要过车子。他身体不好，看病坐公共汽车不方便，组织上反复叮嘱他看病要

打招呼。一次老伴背着他跟单位要车看病，他知道后提前出门赶公共汽车。“车子来了怎么办？”老伴问，“来了就让他回去办公家的事去。”工作人员驾车紧追，眼看他上了公共汽车。小车追到下一站，工作人员让售票员把老头喊了下来，提起这件事，工作人员热泪盈眶。

单位组织老干部到承德疗养，早7：30的火车，他夜里4点出门步行赶到火车站，80岁以前参加区里、机关的学习和活动，他或走或挤公共汽车，80岁后，机关派车可以顺路接3位老同志，老杜怕司机开车进胡同麻烦，每次他早早地来到二环路上等车。司机班的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老杜这位老人真好，我们怎么伺候他都心甘情愿。”

孩子老杜有9个孩子，4个在马背上长大的。他们虽是干部子女，可从没沾过老子的光。生活上自食其力，从没向组织上伸过手，工作安排上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没走过关系提过条件。老五、老六初中毕业，主席发出“上山下乡”的指示，老杜催着他们第二天就去报了名。9个孩子天南地北，全部都在基层工作。“咱家好，工农兵全有，基层工作联系群众。”老杜心满意足。老杜的战友很多都身居高位，孩子们不敢去找，“如果谁用父亲的名义办私事，让他知道他骂死你。”大儿子在顺义教书，爱人病故，孩子到奶奶家来可以转成城市户口，组织上征求老杜意见，“不行，该转到儿子单位去办，老子单位不能管。”老五只身在江西一个工厂工作，希望能调回北京照顾老人，“不行，我身边有子女，局里不能给办。”老杜追下楼嘱咐老干部局的领导同志。

也许是住房紧，也许是经济不宽裕，也许是基层单位出

差机会少，也许是工作忙，老杜生前9个子女没有团聚过，唯一的这次团聚，是孩子们一起为老父亲送行。

位子 1951年，杜明同志因不实之词，受到错误处分和不公平待遇，1993年底，公安部、广东省纪委予以彻底平反，中组部批准，杜明同志部分享受副部级待遇。正当组织上积极安排落实之时，传来杜明同志去世的消息，大家痛心疾首，为我党失去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而悲痛。

40多年来，杜明同志忍辱负重，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刚解放，杜明定为行政11级，工资190多元。40多年来，级别没长，工资直到90年才调整。孩子们、周围的同事却没听老杜提及过此事。开会学习，他总是抢着发言，从没听他发过牢骚，他相信组织相信党，他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老部下听说老杜还是11级，打抱不平要找组织，他淡然一笑劝阻了。

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逢年过节，买上一瓶酒带上两斤糖，他要慰问工作人员。谁要去看他，他迎进送出，谁为他干点事，他连声感谢。他身上总体现出一种军人作风。单位组织到外地疗养，老部下来请，他也要向工作人员请假，时间一到，哪怕正聊在兴头上，他也要准时归队。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大夫说，让老杜住院是最头疼的事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住院，两星期为界，一到日子准要求出院。“我老了，不能给组织上千点什么了，能省点省点吧。”大夫给的药，他总是节省着吃，急得大夫气不得恼不得。不是合同医院看的病，药费他自己掏腰包从不报销。1991年老杜肺心病很重，大夫强行安排他住院，住院第3天，他就瘫痪了，再也没能出院。

样子老杜对学习十分重视，单位的党日学习日他从没缺过勤。不到200元的收入养活10多口人的家庭，可打一解放，他就自费定阅《人民日报》，直到临终。论资格，定报的费用完全可由公家报销，他不干。一年下来，他把全年的报纸装订起来，过去，他自己搓纸绳装订，这几年用尼龙绳。报上密密麻麻地划着重点，记着符号。老杜文化不高，但他坚持记学习笔记，孩子们用剩的废纸，他一张张订在一起，长短不一颜色各异的纸张装订成的小本子，不由得使人想起当年老杜在抗日军政大学当学员时用的识字课本。

老干部文明监督队、老干部传统报告团成立了，老杜积极报名参加活动。一次文监队活动检查商店服务，正在住院的老杜不知怎么知道了，他向医院请假坚持参加检查活动，活动结束后，他又归队继续住院。他为全区十几个机关、中小学校做传统报告，扩大党的影响。报告会后，他不收任何礼品，一个学校送来一床被面，他让女儿送了回去。老杜是我党培养的第一批保卫干部，遵义会议，他担任会议内保工作，亚运期间，他和楼里的几名老伙伴自发组织起巡逻队，维护住区的治安。

杜明同志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在全社会树立了老党员的光辉形象。

告别仪式上，机关离休支部的同志们来了，街坊邻居们来了，工作人员来了，他们列队向杜明同志的遗体鞠躬，纪念这位德高望众的老人，寄托哀思无限。

涓涓细流汇集成浩瀚的大海，细微之处构成杜明同志高尚的品德。

录明代诗人于谦的绝句《咏石灰》一首：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间。

谨以此文此诗献给杜明同志。

杜明同志永垂不朽！

半个世纪的追忆

卢衍琪

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五周年纪念日就要来临了，在这个不平凡日子来临的前夕，我的脑海里又自然而然浮现出那个终生敬仰的形象：他，二十三四岁，中等匀称的身材，大平头，头发根根直竖着；红朴朴的脸蛋，镶嵌着一双漂亮而聪慧的眼睛；鼻梁上架着副深度的近视镜，镜片后面，常常放射出两道似乎可以穿透人们内心世界的灵光；他时常面带笑容，从外表看，颇有几分温和柔顺的女子气，然而他却是一个外柔内刚的铮铮铁汉子。他是谁，他就是我半世纪以来缅怀不已的敬爱的陈宗圭老师，后来才知道他还是一个勇敢坚强而又机敏过人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1947年秋季，陈宗圭老师来到泰宁县立初级中学任教。那时，我刚好在这个学校读初三，陈老师任我班的数学课，有幸受到他的谆谆教诲。上课铃声刚响，教室门口迅即闪进一个身着浅色而洁净的青年装、面带笑容、看起来十分活跃而又不失教师庄重的青年老师。一进教室，他使用非常温和的口气笑着做自我介绍，并且谦虚地说，让我们互相学习，共同研讨，出色地完成这门功课的学习任务吧。一开始他就用自己的语言行动，塑造出一个在学生心目中感到可敬可爱的教师形象；第一堂课，就给学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

她记得当时的情景，甚而至于可以重现当时陈老师的音容笑貌。陈老师的教学语言非常生动活泼，他能把枯燥无味的数学课讲得非常直观，非常形象，有很强的可接受性；并且常常辅以手势，加上某些令人兴奋的幽默姿势，以及和蔼可亲的面部表情，使同学们在与老师和谐融洽的思想智慧交流中，在大脑皮层高度兴奋的状态下有效地接受那些乏味的数学公式原理，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记得有一次，陈老师讲“幂”这一节时，他用了一个帽子、两个帽子、三个帽子、……做比，把一个数自乘若干次的形式，讲解得很是形象生动，引起大家的兴趣，大家很快就把“幂”的内涵意义理解了，做起作业来，也感到非常轻松。陈老师还有一个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地方，就是在当时一般老师都只管上课，上完课便夹起教本一走了事的情况下，他却经常主动找学生做个别课外辅导。学生有什么惑而不解的难题向他求教，他总是用温和的态度耐心地做启发式的讲解，直到学生完全理解了为止。做为一个教师，从教书的一面说，他称得上是一个有高水平、高技能、精技巧，认真负责，备受学生欢迎，深得学生尊敬爱戴的好老师。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已经年逾花甲的老学生，一提起陈老师，都会异口同声地称赞说：陈老师真帅！

然而，我要着重追忆的是他的另一面，是他做为一个地下党员在黑暗中如何以教师的身份烛照蒙昧的学生这一面。这里我想追忆至今印象仍然十分清晰的五件事，以见一斑。

其一、在纪念周会上大胆公开地介绍马列，巧妙地传递解放战争的胜利信息。

国民党时期，学校有这么一个惯例，每个星期一上午第一节课要做纪念周，纪念周由校长亲自主持，向孙总理默哀三

分钟、背诵总理遗嘱、布置一周工作，而后由一位教师做一个专题报告。有一次，轮到陈老师做报告了。他先让我们给他扛来一块可移动的木制黑板放在讲台上，而后登上讲台，用极其迅捷的动作，一眨眼工夫便画成了一幅中国地图。紧接着他开始讲话了。他先是讲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了《资本论》，说他们是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还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等等，等等。后来他把话题一转，用客观平和的语调，指着地图一一介绍起解放战争时期各战区两军交战的战况来，并且还说，在闽浙赣边区，在广东海南岛琼崖地区，甚至在全国各地，都有共产党在活动，巧妙地透露了“国军”失败的战讯，透露了迅速发展的解放战争新形势的秘密。这些闻所未闻的新闻，在当时完全处于封闭状态的学生们听起来，当然不甚了了，然而它的诱导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如我似的学生，还曾留下了半个世纪未曾泯灭的深刻印象。记得当时陈老师讲完话，校长李光珂老先生曾经立刻上台做过消除影响式的解释。但陈老师讲的是事实，事实总是事实，谁又能消除得了呢？况且播进人们心里的种子，总是要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谁也不能抑制其自发生长的能力。

其二、在学生宿舍里挑灯读报，不留痕迹地引导我们关心解放战争的胜利新形势。

开学不久，陈老师就在我们初三寄宿生宿舍里安上了一张桌子，天天晚上都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几份当天送来的报纸，在那里挑灯夜读。他时而根据报上的消息，快地翻查地图，时而指着地图的某一部分，细细地阅读报上的每一则消息；时而自言自语讲些什么，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时而巧妙地告诉大家“国军”又失败了，在貌似惋惜的背后隐藏着难以

抑制的兴奋情绪，时而叫我们看某一重要新闻，在平常的话语中饱含着期待希望的深情。追忆起来，那情景够美妙的了。只可惜当时我们对陈老师言行举止的用意不甚理会，辜负了他的拳拳之心，以至于留下了半个世纪的遗憾。

其三、抓住《正义报》，进行合法斗争。

据说《正义报》，本是国民党泰宁县党部办的党报。但那些党魁们不安好心地聘请陈老师当主编（见魏钧等人的《忆陈宗圭同志》）。可能是我当时的字写得比较好，并且喜欢跟老师接近的缘故吧，陈老师曾多次将他编好的稿件交给我刻写，因此回忆起来，还能记得报上登的一些内容。概而言之，有报道解放战争战况的，有透露国民党地方势力间狗咬狗斗争和贪污贿选实况的（当时正在演党选“国大代表”的闹剧），当然也有介绍泰宁风土民情以及某些地方性新闻的，记得其中有一期几乎是专门议论疏通北坝沟这一桩好事的号外，对当时政府组织疏通北坝沟的举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其四、“出纪念专刊写稿，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人云亦云。”

那是“双十节”前一天的下午，我们班的纪念专刊上墙了。做为主编的我，这时不免有点完成一件大事后的兴奋和喜悦。正在我踌躇满志、留连于专刊前的时候，陈老师面带笑容地走来了。他一面看我们的专刊，一面频频点头说我们刊出的某一篇短文写得不错，还称赞我们专刊的版面设计比较美观。正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陈老师忽然笑着对我说：“衍琪呀，你们的写作水平都不错，只是少了点自己的思想，你们稿件上的话，似乎大多数都是跟着别人说的，以后你们写东